

作为十朝古都,南京城里发生过数不清的故事。那些远去的昨天,常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露出一张面目模糊的脸。从本期起,《发现》周刊特别推出《历史上的今天》,挖掘被掩埋的细节,以飨读者。

1936年12月14日这天,南京街头平日卖得特别寒碜的《中央日报》突然洛阳纸贵,刚上摊儿一会儿工夫就销售告罄。因为就在昨天,《中央日报》在第三版刊出了一则新闻——《张学良率部叛变》,短短六百多字,一时间引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:蒋介石被拜把兄弟给武力扣留在西安了,消息是真的吗?

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,“官报”《中央日报》自然比一般报纸消息更加可靠。果然,12月14日“京市新闻”版上,《市府布告严禁造谣》的标题赫然出现在头条。文章告知各界,两天前的西安事变“中央有适当处置,望市民力持镇静各安生业。京各界致电慰问蒋委员长。”然而在这条消息的周围,围绕的是《京市今日举行冬季大扫除》、《第六届集团结婚明日举行》、《玄武湖捕鱼,两日捕鱼百余担》这样的“市民”新闻。对于南京而言,西安事变,这似乎只是一个来自西安的不幸消息,事实果真如此吗?



张学良(前排左)和蒋介石(前排右) 资料图片

# 12·14西安事变两天后的南京乱象

- 蒋介石在西安被抓,南京的媒体作何反应
- 真救蒋假救蒋,南京军政界要人的幕后闹剧
- 作为民国首都,南京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



戴季陶

## 戴季陶铁汤池公馆内下跪“主和”

1936年12月12日晨5时,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兵变,蒋介石被武力扣留,西安事变爆发。由于事发突然,南京的高层得到消息已是这天的下午。

据冯玉祥日记记载,12日下午,在位于南京斗鸡巷4号何应钦家中,政要们聚集在一起。刚刚切入到实质问题,分歧出现了。“一、协和(李烈钧)主张安全介石为主。二、陈璧君主安全。三、陈公博亦然。四、朱益之主打。五、何敬之主打。六、叶楚傖主打。七、戴季陶主打。”意见没有得到统一,他们决定用最快速度将蒋介石“蒙难”西安的事情告知国民政府的官员们,并商讨对策。

从国民政府《中央日报》12月14日的新闻可见,国民党中央是于12日晚12时召开紧急会议,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、国民政府铨叙部政务次长、几次中常委会议记录的王子壮在他的日记手稿本中记载,但凡能够及时赶回南京出现在会场的人员基本到齐,共计38人。

第二天晨,宋美龄、孔祥熙从上海赶到南京。当天下午3时至5时半在位于丁家桥16号的中央党部召开会议,紧急磋商。随后至蒋介石返回南京为止的14天时间里,这里车流不息,召开的大会小会一个接着一个,前后不下20次。会议的焦点就在于对张学良“打”或“不打”。

考试院长戴季陶认为对张学良、杨虎城应坚决开战,态度异常激烈。与何应钦不同的是,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,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。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,力陈利弊,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。

当时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高级会议的黄绍竑,在《西安事变亲历记》中回忆,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在中山东路128号、国民政府财政部内的孔祥熙南京铁汤池公馆。休会时,戴季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,说:“我是信佛的。活佛在拉萨,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,一是由西康经昌都,二是由青海经玉树,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。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,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,这条不通走另一条,总有一条走得通的,不要光走一条路。”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,退了席。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,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,知戴季陶转了向,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。

## 南京各界组织赴难团,空谈“救主”

蒋介石在西安“蒙难”的消息传来,“民间”也忙得热火朝天起来。各机关各行业,包括学校、工商界等团体都纷纷表示要“效忠党国”,并“通电讨逆”。

接着是付出实际行动的问题。《发现》周刊记者在12月23日的《中央日报》上看到,12月22日上午九点,召集的各界扩大纪念周大会上,有关方面做出决定,“即日组织首都各界救国赴难团,营救蒋委员长出险。”会场气氛悲壮紧张,各代表均奋不顾身,愿赴西安营救蒋委员长,至11时,始高呼口号散会。散会后,各界代表自动报名参加营救蒋委员长赴难团者,甚为踊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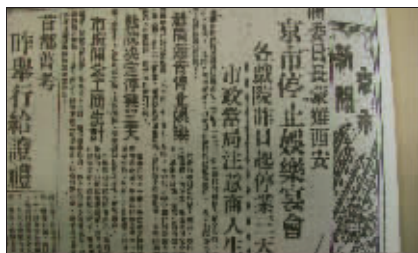
而南京童军组织营救会长(编者注:指蒋介石)讨逆服务团也很快成立,南京城里许多

小学的学生都报名踊跃,拟定参加资格并推定领队人员,待截止报名后即准备出发。

南京市民众代表及各机关都宣传讨逆,当时的情景可谓“首都百万市民,咸欲争食张逆之肉而寝其皮以为快”。

各类赴难团成立了不少,只是到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止,没有一个赴难团有离开南京、奔赴西安的“壮举”。

## 市政府宣布全面停止娱乐宴会



西安事变后,《中央日报》刊发南京城内停止娱乐宴会的文章

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,以往都是夜夜笙歌。蒋介石被困西安的消息传来后,人们也一如往常。南京市政府社会局觉得不妥,遂于12月21日通过南京的各种纸媒,从《中央日报》到广受欢迎的《南京人报》宣布,在领袖蒙难期间,全市停止娱乐宴会,并禁止跳舞。并建议中央转明广播电台,在此期间,停止音乐游戏节目。很快,中央电台广播节目对内容进行调整,侧重时事要闻,以唤起全体国民讨逆杀贼,音乐节目改播军乐、国乐及雄壮的爱国歌曲。

此外,戏院业协会决定停业三天,以伸义愤,这三天时间是22日到24日。原本计划上映的电影往后顺延。

1936年帮助父亲在南京下关一带经营茶馆的王女士还记得,茶馆里原本说书唱小调的艺人在那段时间被禁止表演。“但茶客反而比以前多了,原本不爱喝茶的也来了,茶馆成了大家打探消息的地方。以前下午三四点就打烩,西安事变期间,都要到天黑了才关门。”

而家住孝陵卫经营酒坊的86岁的江家华老人也记得,那段时间,自家酒坊的订酒量急剧减少。“虽然禁止宴会的时间有限,但在蒋介石回南京之前,谁也不敢摆酒席,那段时间,南京城里没人办喜事。我们家在那年的十二月生意不好做,全靠周边一些零散的销售在维持。”

## 南京宣布戒严,病人就医需持警察证明

与此同时,国民党当局考虑到南京作为首都所在地,可能会有极端分子来“趁乱打劫”,扰乱秩序,遂决定加强防范。首都宪警当局接到命令后,对治安尤为注意,南京警备司令部更是于12月16日起宣布戒严。

之后,南京街头的宪警明显增多。宪兵方面加派步哨巡逻,昼夜警戒。警察方面,自下午五点起到翌日上午七点戒备。而且,宪警联合检查旅店、对特种户口比如外来临时户口随时加紧检查。此外,公共汽车行时间及茶楼酒馆营业时间均不得过夜间十二点。为了避免误会,禁止燃放爆竹,这个规定由警察挨户通知。

每日夜间自十二点起各宪警步哨岗位,得检查行人车辆,对普通人给予警告,而对可疑人暂行扣留;夜间一点以后,市民不得再行外出,但遇病人求医或产妇,经所在地警察证明,得许通过。凡于禁止通行时间,各军事要地及各重要机关附近,自夜间十二点起,绝对禁止闲人接近或无故通行。

“总的来说,西安事变后对于南京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来说影响不是很大。”王女士说。

## 南京童家巷17号陷入一片悲哀

但对于少部分南京百姓来说,西安事变的爆发,无异于当头一棒;他们的亲人已随同蒋介石到了西安,近况如何,无从知晓。

在惶恐不安中度过几天后,12月15日,位于南京童家巷17号的邵宅隐约得到消息,说跟随蒋介石前往西安的邵元冲在事变中受伤。邵宅陷入一片慌乱,邵夫人即大名鼎鼎的民国女权运动家张默君赶紧电询张学良,被告知12日当天,邵元冲从西京招待所跳窗逃遁时,被士兵开枪击伤,送到医院救治,于13日晚医治无效离世。年仅46岁的邵元冲英年早逝让邵宅陷入一片悲哀中。

邵元冲,字翼如,博学多才,曾是民国第一任杭州市市长,曾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。因此,他是国民党中当之无愧的元老级人物。邵元冲的身故一方面令人悲恸欲绝,另外一方面,又成了国民政府号召民众“讨逆”的幌子。

12月21日《中央日报》第一张第三版头条位置上,邵宅关于邵元冲的讣告赫然醒目,上书“报丧 顷接西安 邵翼如先生于十二月十三日晚因西安叛变不幸殉难哀此报 南京童家巷十七号邵宅谨启”。接下来直到蒋介石返回南京的三天里,邵元冲的讣告都出现在头版的位置上。

这个讣告成功地激起了市民对张学良的仇恨。国民政府趁热打铁,一面派各种要员前往邵宅吊唁,发表各式慷慨激昂的“讨张檄文”,一面在《中央日报》上发文,准备在25日遥祭尸体还在西安的邵元冲。12月25日,《中央日报》第三张第一版专发了“中央遥祭邵翼如先生暨在西安殉难诸同志特刊”,林森、李烈钧、冯玉祥都在特刊中题词悼念。



《中央日报》接连刊发邵府发布的讣告

那么,跟随蒋介石前往西安的其他人员情况又如何呢?据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当年12月23日的文章说,蒋介石此次前往西安时,随从官佐共五十二人,殉难者四十六人,其中包括他的侄子蒋孝先。

## 有南京市民要求枪毙张学良

除此之外,南京方面开始了对西安事变的“始作俑者”张学良展开了各种攻击。比如,在12月19日《中央日报》副刊“中央公园”上,刊登了一篇署名为“浣花”的文章。

文中说,大概民国十七年,有一群匪寇,

在某地猖獗起来,这匪寇的大头目,却是“行不改名,坐不改姓”的张学良。关于这个假黑旋风的消息,自然很快地传到了真黑旋风的耳朵里,张学良赫然震怒道:“他也配叫张学良?”于是在一纸命令之下,那个张学良,不“学良”而“学狼”了。这不知是哪位秘书的高见,因为古时流氓,叫做白狼,那么,在良字上加个反犬旁,遂十足地画出一个强盗形来。其后,东北军旅方面,有个上尉副官,名字也和张学良一般无二,在某次的呈文里,被张学良发觉了,随即在后面批诫道:“冒用长官名字,实属不敬;该张学良伪即改名。”这位无权无勇的张学良,虽没有被派做学狼,但在咫尺权威的压迫下,只有奉命维护,偷偷不学良了。

文章中还质疑,从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,张学良对他自己的名字是如何爱惜,何以现在又“形同匪寇”,背叛党国,劫持统帅,不“学良”而“学狼”。

“西安事变的消息刚传到南京,茶馆里的茶客谈起来都不相信,说张学良那是好人,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拜把兄弟给扣下来了?或许有什么误会吧。但几天之后,随着报纸上对此事的分析,茶客们就越来越认定张学良真的不是个东西了。”王女士告诉记者,张学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南京形象十分高大,但这次事件后,张学良就“声名狼藉”了。后来,他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,许多市民都要求枪毙张学良。

## 大批市民拥到大校场机场迎接蒋介石

在各方势力的斡旋下,12月25日,蒋介石安全离开西安。当天下午五点半,抵达洛阳。而消息传到南京,是在他抵达洛阳二十分钟之后。而最先得知消息的,便是《中央日报》。该报在六点之前,一面开始印号外,并通知各电影院,将这个好消息用幻灯片报告观众,一面在报馆的门口立即贴了两张“临时壁报”,写着“蒋委员长安抵洛阳”几个字。

该报报馆还预备了一辆大卡车,围上“蒋委员长安抵洛阳”的布标语,边开边燃放鞭炮。卡车先向夫子庙方向开去,沿途许许多多人都被鞭炮声吸引了出来。当《中央日报》的工作人员第二次(六点半)带了号外再向夫子庙驶去时,一路上老百姓燃放的鞭炮声已不绝于耳。从华侨路一直到夫子庙,沿路人山人海,许多商店都挂起国旗来,以示庆祝。12月26日的《中央日报》在第二张第三版上以《昨晚全市狂欢,本报散发号外》为题,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报道了相关情况。

26日,蒋介石返回南京,一时太平路、中山东路、黄埔路、明故宫及由明故宫至中华门一带,有超过四十万人出门迎接。大校场机场四周挤满了热情的市民。

“我13岁,读小学高年级,老师带我们上午八点钟从孝陵卫出发,赶到大校场,已经快11点半了,我们排着长长的队,走了整整三个多小时的路,很兴奋,没觉得累。”江家华老人告诉记者,他觉得,那个时候,百姓们对蒋介石平安归来的热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。

蒋介石被困西安前后14天,南京百姓也高度关注了14天。至于蒋介石为何被张学良困在西安,随着国民党当局的舆论导向,市民鲜有关心。毛泽东在当年也曾对这事发表了自己的忧虑。记者在中央档案馆编纂的《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》一书第227页中看到,12月19日,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:“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(张、杨)捉蒋问题上,把张、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……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。”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